

【思想文化研究】

论《周易》中圣人崇拜思想及影响

谭德贵

(山东省社科院 哲学所, 山东 济南 250002)

摘要:《周易》的圣人崇拜思想,既有积极作用,更多的是消极作用,必须在新时代加以转换。

关键词:圣人崇拜;境界;圣人;负作用

中图分类号: B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248(2002)04-0011-04

On the Thoughts of Worship of the Sage and Its Influence

TAN De-gui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Shando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Jinan 250002, China)

Abstract The thought of worship of the sage in the book Zhou Yi has more passive functions than its active functions, and we must transform it.

Key words worship of the sage; realm; the sage; inactive function

圣人崇拜是中国文化的基本内容之一,无论是精英文化,还是大众文化,都可以看到圣人崇拜的影响。

那么,为什么中国文化会走上圣人崇拜之路?它对中华文明的发展有何影响?

一、产生的背景

原始人类,以为万物和人一样有灵魂,形成对自然、祖先崇拜敬畏的心理。“在原始人看来,自然力是某种异己的神密的超越一切的东西,在所有文明民族所经历的一定阶段上,他们用人格化的方法来同化自然力,从而创造了许多神。”^[1]随着社会的发展,先民逐渐将物质和精神、人与自然加以分离,一些民族在其后来的发展中,不断地将物质和精神、人与自然的差异扩大,形成了二者的斗争,从而造成了极大的个人虚无感和族类宿命感。在此基础上,他们将原始的自然宗教发展成高级意义上的宗教,创造了一个至高无上的神来统治宇宙,而在华夏民族,这种自然崇拜的宗教心理,在原始社会后期发展成根深蒂固的崇天意识。

从社会政治方面看,自远古的氏族时代起,祭天传统一直在历代帝王中留传下来,上古的尧舜禅让就是以报告天帝、祭祀天地四时和山川群神的形式

进行的。作为“天子”的历代皇帝,必于每年冬至日举行一年一度最隆重的典礼——祭天大典,对天行子礼,天不仅成了统治起源与存在的原始本体证明,而且成了社会变革、王朝更迭的最终裁定者,“替天行道”成了历代新生力量变革社会的最有号召力的口号(从王朝变换到农民起义)。

为了探讨天意,夏时已开始用兽骨卜天意,到了殷商,无论大事小事,几乎无事不卜,无日不卜,并选择了最早的知识分子——巫,从事解卜工作。周文化在吸收殷之卜文化基础上,使卜筮发生了质的转换,逐渐向天人合一观念发展。殷人一味沉湎于天意,不修政治,最后导致亡国亡君,说明天是有规律的自然之天,人类必须按其规律而行。从现实看,小邦周之所以能战胜大国殷,主要是以“德”取胜,是周人继承了天之生、生之德而成,天的神味逐渐消失,人的作用日渐凸现,天地人三才合一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

但是,这样一来,周人又面临一个难题:一方面,随着天帝意识的淡化,周人统治合理性的原始本体证明受到冲击,其合理性从何而来?只有树立周王大仁大勇的圣人形象之路了;另一方面,对于天意的探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能委诸卜筮,但用何种筮法?卜后如何而断?如何将对自然之道的探讨与

收稿日期: 2002-07-09

作者简介: 谭德贵, (1964-) 男, 山东威海人, 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哲学研究。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人的主观能动性结合? 这些问题的解决,靠一般人是不行的,而且容易造成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使思想不能统一,也会危及统治。要解决这些问题,圣人的出现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这种思想在春秋战国时已完全系统化,因此,“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的《周易》历史地承担了这一使命。撇开作为中国文化“源头活水”的《周易》,就无从探讨华夏文明,更无法搞清圣人崇拜的具体内容,下面笔者将集中探讨一下《周易》中圣人崇拜的内容及其在后代的发展。

二、内容

《周易》中没有对“圣”与“圣人”下过明确的定义,但在具体论述中,有20多处用过“圣人”这个词,并对圣人的人格有所论述

(一)圣人道德完满

圣人之德是天地之德的外化,“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系辞下》)^[2]。也就是说,圣人有生生之大德。能赞天地之化育。后人对此也有具体论述,如孟子:“规矩,方员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离娄上》)^[3]。荀子说:“圣人,道之极也。”(《礼论》)^[4]。

(二)圣人无所不知

在《周易》一书看来,圣人是“大知之人”,是“知周乎万物”,即通晓天地人三才之道的人,是“聪明睿智神武而不杀”的人,是“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的人,圣人能知变化之道,能“知神之所为”,能“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务”,圣人的知能达到“精义入神”、“穷神知化”的程度(《系辞传》)^[2]。用朱熹的话说:“道是无躯壳的圣人,圣人便是无躯壳的道。”(《朱子语类·卷八》)^[4]。

(三)圣人功业博大,普济苍生

一方面,圣人是治国安邦之王,圣人能“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2]。另一方面,中国古代的所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制度文明是圣人仰观俯察天地之道而创立的,“昔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于是始作八卦,以通”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系辞传·下》)^[2]。

(四)圣人的神化境界

圣人可以赞天地之化育,普济众生,达到与道合一、真善美统一身的境界。“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

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乾·文言》)^[2]。这相当于孔子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用《中庸》一书概括,就是圣人能“不思而得,不免而中,从容中道”。

(五)圣人创设经典

“昔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系辞传下》)^[2]。那么,《周易》为什么可以成为这样一部经典呢?“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2]。具体讲,“《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以君子将有为也,交有行也,问焉而以言”(《系辞传上》)^[2]。“是故群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系辞传上》)。概括讲,只要把《周易》学好,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由此可见,圣人崇拜思想在《周易》中已基本定型,后代儒者不过是在此基础上将其进一步深化。那么,它具体表现在哪几方面呢?

第一,“圣人作,贤人述”。这是孔子提出的,孔子虽被后世奉为圣人,但本人认为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其他后世儒者更只有作和述的份了。

第二,道统说。真理是由圣人一线单传的,其系统包括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孟,除此之外,皆为异端,此说由韩愈提出后经统治阶级钦定,成为定论。

第三,学为圣人。儒学就是以“学为圣人”为宗旨的,“尧舜是生而知之,汤武是学而能之,文王之德,则似尧舜,禹之德,则似汤武”(《河南程氏遗书》)。只要苦读圣书,就可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虽有此说,但孟子之后再无圣人出现。

第四,圣被神秘化。随着封建大一统的形成,圣人的神秘性加剧,东汉兴起的谶纬之学的内容之一就是大力神化圣人《春秋纬·演孔图》就把孔子封为仰推天命、俯测时变,反观过去、预解未来的天生“玄圣”,是其母与黑帝梦交所生。东汉的儒生则认为圣人皆有异表,“黄帝龙颜”、“尧眉八彩”、“舜重瞳子”、

“禹耳三漏”、“文王四乳”、“孔子反宇”。

三、影响

作为中国文化价值取向的核心之一,圣人崇拜在几千年的华夏历史中,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客观地讲,圣人崇拜对中国文化的生存与发展,既有积极的作用,又有消极的作用。下面,我们将从正反两方面加以评析。

(一)积极作用

1. 圣人崇拜是使中国文化走上了实用理性之路的重要原因。圣人崇拜使从殷商巫史文化中解放出来,既没有走向闲遐从容的抽象思辨之路(如希腊),也没有沉入厌弃人世的追求解脱之道(如印度),而是执着人世间的实用追求。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人际关系占据了思想的首要地位。从哲学上看,中国古代的辩证法思想虽然丰富,但它是处理人生的辩证法,而不是概念的辩证法;是互补的辩证法,不是否定的辩证法;是强调统一的,不是强调对立的。中国也讲认识论,但它是从属于伦理学的,强调的是伦理责任的自觉意识,从孔子的“未知焉得仁”到理学的“格物致知”皆如此。从思维模式看,中国文化缺乏有严格的推理形式的理论探索,执着于从模糊笼统的全局性的整体把握和直观中,去追求和获得某种非逻辑、非纯思辨、非形式分析所能得到的真理和领悟,养成了一种清醒冷静而又温情脉脉的中庸心理:不狂暴、不玄想、贵领悟、轻逻辑、重现实、好历史,以服务于现实生活为目标。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理性,这种传统使得中华民族成为一个最务实、最勤劳的民族,这种特点,在现代化的今天也是很有作用的,如果人人务实,不狂热、不玄想,努力实干,我们国家的昌盛就指日可待了。

2. 圣人崇拜是使中国文化成为乐感文化的重要因素。中国的圣人是人不是神,“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子不语怪力乱神”。“天人合一”就要求人于有限中获得无限,在人间获道,呈现了对人生、感性世界的肯定与执着;“未知生,焉知死”奠定了中华民族重生轻死的传统,宗教式的自罚与心灵冲突造成的悲观在中国文化中没有市场,中国圣人虽要求人们有忧患意识,但却更要求人们以乐观态度对待人生,不管遇到何种困难,都要保持一种奋发向上、自强不息的精神,在这方面,孔子强调的最多,“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见《论语》)。正是这种对人生、对世界的乐观态度,使中华民族几经劫难而又长

生,在现代化建设中,只要我们合理继承这一人生态度,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西方文明带来的负作用。

3. 圣人崇拜表现了炎黄子孙从支配人们的外部力量中获得自由和解放的愿望。

第一,它可导致“与天争权”,如唐朝李泌的“君相可以造命”说,宋代张载的“义命合一”说,颜元的“造命回天”说。从《易大传》的则天有为说,发展到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表达了中国人不屈服于天的积极心理,所以无论中国历史上遇到多少自然灾害,炎黄子孙都没被征服过,而终于战胜了一切困难。

第二,可对政治进行适当干预。中国人想了三种方法:天遣、圣人经典、历史记录。所谓天遣,就是用自然界的变化(天之兆象)对统治者进行劝谏,如遇自然灾害(蝗灾、地震、山崩、日蚀、月蚀等)则大臣们上书皇帝,认为乃皇帝为政不仁而致灾,须改过(历史上有些皇帝为此下过罪己诏,这种思想在《周易》中已露(天垂象,圣人则之),至董仲舒那里已被固定。另一种方法就是用圣人经典的有关条文对当朝君主的胡作非为进行规劝,或以教授授徒的方式议论朝政,左右舆论。后世儒者称孔子为素王,同时反衬着帝王的德行,对于推行开明政治、反对霸道有很大作用。所谓历史记录,就是通过修史书来约束帝王言行(古代宫中专设有记载帝王言行的史官),而史书本身也是以圣人标准来修定的,“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正是此意,上述的三种方法都离不开圣人。

第三,对维护大一统有重大作用。一方面,对“日用而不知”的百姓来说,圣人成为一个必须服从敬畏的偶像,科举制又使士阶层(知识分子)的思想为圣人同化,圣人的天下一统思想成为一种坚定的信念深入人心,使分裂者自古不得人心。另一方面,圣人道统的单一持续性,对于保证中国文化的连续性有无可比拟的作用,这就从文化上确保了中国大一统的可行性,这是中国几千年虽经多次分裂、王朝更迭而大一统始终不变的重要原因。

(二)消极作用

同其他以颠倒形式反映社会存在的意识形态一样,圣人崇拜也是把人的本质变成幻想的真实性,把群体的才能聚于一人之身,不过不是以神的形式出现,而是以人的形式出现,在看到它的积极作用的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它的消极作用。

1. 圣人标准抹煞了实践标准。圣人标准不能适应一切社会,特别不能适应处于动荡和转型时期的

社会现实,中国近代史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可叹的是,这种悲剧在“文革”中登峰造极,不过是“圣人”换成了“领袖”而已,直到今日我们对那种“一句顶一万句”的巨大威力还心有余悸,清除这种残余在市场经济的今天更有必要。

2. 由于“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加上悟道的思维方式,科举制的推行,使得对自然的研究及实证科学的方法在中国一直没有市场,自然科学家在历史上没有正当地位,虽然大一统的需要促进了某些实用技术的发展(如天文学),但由于圣人经典的限制,这些技术成了“方术”、“雕虫小技”而不登大雅之堂,这从根本上阻碍了中国自然科学的总体发展。在今天,我们更要彻底批判这种思想,大力发展科学,以促进国家昌盛。

3. 圣人的神化,使得其它一切认识主体都不复存在,由此造成注解圣人经典并用经典来检验这些解释是否正确成为中国文化的主线,即一种固定化、公式化的经学思维方式。中国历史凡是登大雅之堂的学问绝对不超出经学范围,即使是具有非凡批判精神和理论勇气的思想家,也不敢轻言否定圣人之道乃万世衡准,在进行学术交流和思想交锋时,打击对方最有力的武器便是“非圣无法”、“曲解圣人之论”,要立论有据,则必须从圣人的“微言大义”中寻找论据。

4. 复古与泥古。圣人崇拜使复古成为一种流行的思维方式,因为圣人皆是古人,“古”必然成为价值判断的标准和认识的前提。食古不化的腐儒进一步认为,古制是不能变的,即“天不变,道亦不变,祖宗之法更不可变”。这种浓烈的怀古情调和怀古思维,使人们不敢越古一步,循规蹈矩,颂古非今成为普遍形式。借古造伪(古代许多著作是假托圣人之名,如《黄帝内经》等),托古改制(康有为曾写《孔子改制考》来为变法寻找理论根基)非常普遍,从而使华夏民族在封建社会后期越来越失去活力。

5. 圣人崇拜导致严重的文化排外主义。明朝中叶以前,中国在当时的世界上走在前列,由此形成了“天朝”的概念,即中国不但是天下地理之中心,也是天下文化的中心,并且是单一辐射方式向四夷传播

那么,中国的圣人也必然是最伟大的。一方面,圣人与经典成为划分夏夷的标准,其他进入中原的文化,凡不合圣人者或被排斥或被同化(佛教的中国化很能说明问题)。另一方面,对于外来文化,圣人标准演化为一种强制性、附会的同化方法,或采取包容方法,如近代对西方“船坚炮利”认为是中国古已有之,或采用否定法(夷狄所为,雕虫小技)顽固排斥先进文化,日渐失去了广阔的文化胸怀,从而在西方的火与剑的冲击下,全面败北。

6. 导致民族性格奴性化。圣人与经典的巨大统摄力,使得一般人根本成不了独立的个体,虽然圣人也讲人格独立(如孔子的“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孟子的“养浩然之气”),但却被圣人所独占,不能独立思考。没有行动自由的人如何独立?相反,历代封建皇帝往往自封为“圣君”,借圣人旗帜和专制的淫威为所欲为,造成极端膨胀的变态人格,这两者结合,使得华夏民族在近代越来越失去竞争力与创造力。

当然,做为一种文化现象,圣人崇拜是中国古代经济社会的产物,它的作用也只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才能发生。但是,做为一种残余我们绝不能无视它。一方面,文革的领袖崇拜与近十年的“超”人(即“特异功能者”和“气功师”等)崇拜,说明这种影响远未消除,有时会死灰复燃;另一方面,最近十年来,在许多人(特别是青年人)中形成一种否定一切权威、“一切跟着感觉走”的价值失范的混乱局面,表面上是对“圣人”崇拜的反对,实际上是圣人崇拜的另一极端。我们只有通过大力发展科学和文化教育事业,全面提高民族的整体素质,才能摆脱“圣人崇拜”的阴影,从而使中国的社会主义走向完善。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 [2] 唐明邦.周易评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5.
- [3] 孟子.孟子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7.
- [4] 荀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5] 朱熹.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94.
- [6] 姚永朴.论语解注合编[M].合肥:黄山书社,1994.